

明清间平民信奉天主教原因之探析

周萍萍

(南京晓庄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17)

[摘要] 明清之际, 来华耶稣会传教士, 基于中国当时社会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 其宣传众生、天堂地狱等等教义, 以及其特定的一些教仪, 对下层社会的平民产生了很大吸引力, 天主教因此在平民阶层中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关键词] 平民; 天主教; 耶稣会

[中图分类号] B9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902(2004)01-0100-05

以“招万民为徒”为使命的西洋传教士们, 自踏上中国土地后, 就发现中国偶像数目多的难以计数。被誉为“近代来华传教先驱”的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在其著述中对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做了详尽的描写, “全中国各地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这种偶像不仅在庙里供奉, 一座庙里可能就有几千尊偶像, 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私人家里, 按照当地的习惯, 偶像被放置在一定的地方。在公共广场上、在乡村、在船上以及公共建筑的各个角落, 这种到处都有的可厌恶的形象是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东西。”^{[1](P.78)}

但利玛窦对从精神上征服这崇拜偶像的国度充满信心, 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崇拜偶像并不是真正发源于内心, 他指出“可以十分肯定, 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对偶像崇拜这种做作的、可恶的虚构有什么信仰。他们在这上面之所以相信, 惟一的根据便是他们外表上崇奉偶像即使无益, 至少也不会有害。”^{[1](P.78)}利玛窦甚至认为中国人已经准备好崇拜真正的上帝, 而决定放弃以前的偶像崇拜, “这或是因为基督教有

圣洁的名声, 或是因为这支民族有崇拜某种神明的内在资质”^{[1](P.310)}, 仿佛中华归主指日可待。

其实, 利玛窦之所以说“这支民族有崇拜某种神明的内在资质”, 正是他看到了中国人对神灵崇拜不专一, 从而具有信奉他们的真教——天主教的可能性。诚然, “有庙必进, 有佛必拜”、“临时抱佛脚”确是中国人急功近利心态的最好反映, 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一定会改弦易辙, 接受并信奉西洋天主教, 毕竟旧有宗教已经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天主教只有确实能给在信仰上实用主义色彩较浓的中国人心灵上以震撼, 才能促使他们改变信仰, 投入上帝怀抱。

传教士布讲救世福音和接济贫疾令遭受极度剥削或经历困苦状态的人产生感激与崇敬。

明末, 经过两次南京教案, 遭到重创的江南教区, 当时已“不仅未能使教务发达, 且难

[收稿日期] 2003-10-21

[作者简介] 周萍萍(1972-), 女, 南京晓庄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系讲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和宗教学研究。

保存旧状也”^{[2](P.144)}，但是随着入华教士的增多，信教人数也渐大增，以致反教士人黄贞愤怒地说：“万历间，宗伯沈仲雨驱逐之疏霹雳，未几，而此夷旋踵复入，千倍于昔。天下为之所惑，莫知其详”^{[3](卷三，P.33)}。其实，信徒人数渐多，非为沈樵发动的南京教案，打击力度不够，而是明末江南百姓生活困苦，宗教正是他们心灵困厄的反映：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本就是重赋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神宗皇帝派来的税监更是如狼似虎，加上通货膨胀导致谷价上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极大灾难；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接踵而至的洪涝，使得“流亡载道，人相食”。饥荒、蝗灾和天花，“苍生糜烂已极”，百姓真的感觉末日将近。大量难民涌进城市，沦为流民，许多以乞讨或偷窃为生。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使他们不禁对老天爷的公正产生怀疑，“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旧有信仰在此面前不堪一击。

此时，传教士或以金钱救助，或以天堂地狱说相劝，都很容易使百姓受感化而入教。翻检《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可以看出：明末传教士初入中华，1634年是收获颇大的一年，大江南北传教成绩斐然。在这一年，经历过两次教案的南京教区，此时“经毕方济(François Sambiassi)神父之手，竟重新复兴，当年授洗者就有六百人；毕方济曾赴常熟为三百人授洗，脱非僧人愤方济绝其食，群起反对”；“1634年，绛州大饥，高一志(又名曾德昭，Alvare de Smedo)神父犯冒险阻，到处救济难民，为病危者授洗，是年绛州及蒲州府受洗者有一千五百三十人。又立育婴堂收养弃儿，未久得三百人，诸儿饥半死，获生者鲜，然皆受洗礼而终”；同年，郭玛诺(Emmanuel Gomez)神父亦前往陕西，“收养孤儿甚众，并任诊治看护之责，因之染疾，几濒于死”；“1634年，艾儒略(Jules Aleni)神父赴泉州、兴化两地，受洗者二百五十七人”^{[2](P.144; P.93; P.203; P.135)}。

当时最易引起人们兴趣的就是讲述基督教国家的优良风俗。利玛窦神父在传教时发现中国人对诸如“医院、孤儿院、济贫所、照料无依无靠的寡妇和囚犯的慈善团体”等津津乐道，

非常向往，简直就是他们所渴望的大同社会，这给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带来美好期盼。甚至一些秀才举人，都相继要求领洗入教，面对官府责问，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自仲尼之后，人不能学仲尼。天主入中国，劝人为善，使人人学仲尼耳。”青衿儒士的入教，带动周围的人也要求领洗，甚而在被逼背教时还说“秀才不从，则某等亦不从矣”，使仇教者十分恐慌，疾呼“从其教者，人人皆坚信若斯，使之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又何事不可为哉？”^{[3](卷二，P.33)}

二

传教士宣扬众生平等，视彼此互为兄弟姐妹，不以地位高下而区别对待，很快就赢得百姓的好感。起初，人们以为戴儒冠衣儒服的传教士们，是不同于己的“劳心者阶层”，对传教士敬而远之，对教堂也充满敬畏。《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一般人连教会住所的门口都不敢看一看……不久，大家就明白他们的住所是向每个人都开放的，就连许多最穷苦的人也都被争取到基督教方面来。实际上，利玛窦神父的同伴们注意到了不管他在工作中是多么忙碌，他从没有赶走过一个穷人。反之，好像他事先就已安排好了似的，他会留下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愉快的谈话。”^{[1](P.300)}神父的和蔼可亲使下层民众有种被看得起、受重视的感觉，明末在上海城乡一带传教取得较好成绩的毕方济神父，人们交口称赞他“为人仁厚俭朴，和蔼可亲”^{[2](PP.143-144)}，很多教外人都要求领洗入教。

此外，天主教驳斥佛教轮回、宣扬天堂地狱说，使百姓愿意享受终极幸福。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采用对话方式宣扬教义。面对儒者质疑，西士答曰：“若果天主设此轮回美丑之变，必以劝善而惩恶也。设吾弗明记前世所为善恶，何以验今世所值凶吉，果由前世，因而劝乎惩乎？则轮回竟何益焉？”^{[4](PP.50-51)}否定人死后灵魂轮回，提倡修道者后世可以升入天堂，“受无穷之乐，免堕地狱，受不息之殃”^{[4](P.26)}。并谓末日来临、天地将坏时，天主现身空中，对上古以来一切死者，一一审判，善者归天堂，恶者归地狱，永不赦除。一些民

众为免受永堕地狱之苦，最终选择入教。《（奉天学）徐启元行实小记》记载了浙江一个人，素与信徒徐启元为敌，控告他庸医杀人，但后来为怕下地狱，又求徐启元为他授洗，“逾数年，某亦染病，思想一生所为，难免永狱之苦。闻天教有赦罪之权，意欲入教，知付圣水者，必公”^[5](P.1242)。

既然天主教排斥轮回之说，提倡“惟皈依天主教戒者，其灵魂永在天堂，不皈依者，余虽善，灵魂亦必永在地狱”。一些被和尚预测来世托生不好的人，思虑再三，决定入教。李明（Louis le Comte）神父在一封致主教的信中，提到一件很可笑的事，“一位垂死的人要求接受洗礼，因为他认为自己最好是成为基督徒而不是佛教徒。和尚们确实向他断言他应转生为驿站马以报答他受到的皇恩（他食国家俸禄）。他对李明神父说：‘（和尚）劝我说，一旦当我取得这种新地位后，应尽力完成自己义务，千万不要失足、不要尬蹶子、不要咬人和伤害任何人。他们告诉我说要多跑、多吃和尽量耐着性子。你由此便可以博得众神祇的慈悲，它们往往会使一头好牲畜最终变成一个有本领的人和地位相当显赫的官吏……我有时在梦中也觉得自己被披挂马具鞍辔，准备在驿丞的第一鞭打下后就奔驰。我醒来后吓得浑身浸汗，处于精神半失常状态，不知道自己尚为人类还是已变成了马……有人告诉我说贵教的人丝毫不受这些苦厄，圣教中的人永远是人，他们在彼世就如同在本世一样。我请求你们接受我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清楚地知道贵教很难遵守，但即使他更为残酷，我也准备信仰之。无论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更喜欢成为一名基督徒，而不是变成一头牲畜’”^[6](P.150)。

三

十字架、圣水以及一些奇征异兆等使百姓相信天主教具有超凡能力。

广大普通民众不可能做到衣食无忧，时常疾病缠身而无钱救治，或无法救治。他们相信冥冥之中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力，需要从宗教中去乞求救助，保佑一生平安。传教士的圣水及十字架，在他们看来，都有了了不起的魔力。

《利玛窦神父传》记述，“1600年，利玛窦神父进京面圣，宦官马堂在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神父的一个匣子里发现有个木制耶稣死难十字架，上面的血漆得就像是快要滴下来了。他一看，脸上直出怪相，手足狂动不已，然后突然说道：‘好呀，这就是你们的蛊术，要加害皇上哇！如此行妖作祟者岂是好人！’他认真相信这是个危险的玩艺”^[7](P.317)。对于平民百姓而言，他们相信拥有巫术的人能够通天、通神，而与神交通的最好法子就是祈祷，在更多情况下，洗礼似乎是具有巫术作用的一种治疗措施。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利玛窦）渠病时搽擦苏合油等物遍体，云其国疗病之法如是”^[8]（卷三十），苏合油即基督教仪式中常用的圣油。

南京教案中，被抓获的教徒曹秀供称，他和妻子信教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治病，“因妻染痰疾，五年不愈，慕天主教可以禳灾获福，遂与四十年三月间同妻入教，诵天主经，经云：‘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尔名承盛，尔国临格，尔止承行于地，如与天焉。我等望尔，今日与我，我日用粮，尔免我债，如我亦赦负我债者。又不我许陷与诱惑，乃救我与凶恶，亚们。’”^[4]（卷二，P.13）在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握、难以预料的情况之下，人们往往需要一种切实的安慰，尽管他们不一定理解天主教教理的真正含义，如曹秀劝别人入教时，理由很简单，“天主生天、生地、生万物，汝何不从之？”但他们天真而又满怀希望地认为只要信了这种教，就会给自己带来一定好处。殷弘绪（François - Xavier d' Entrecolles）神父在致杜赫德（P. Du Halde）神父的信中写道，“（信徒）缠住我不放，要圣物、圣牌、圣像和念珠，他们迫不及待地讨圣水，他们把它放在瓷瓶里封好，他们非常高兴地听我教他们怎样永久保存它的秘密。一般说，我们的新信徒很相信这圣水，这圣水非常灵验，他们经常互相交流它的神奇效应，上帝补偿了他们诚挚的信仰。”^[9](P.201)

另外，中国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导致大批民众对突然出现的“神迹”趋之若鹜。他们特别崇拜拥有超凡法力的人或自然界显现的瑞征，认为对之顶礼膜拜可使自己免受病害、灾难，保佑生活安定。这些“神迹”

包括意想不到的康复、驱邪等等,在当时来自江南的材料中随处可见,如苏州的一位女教徒曾相信迷信活动;Saint Jerome在她的睡梦中对她进行了一番责备,她受到了惩罚,右手无法活动,后来她在一次公开的忏悔之后才得到恢复^{[10](P.482)}。1701年,沙守信(Émeric de Chavagnac)神父转述了毕嘉(Jean-Dominique Gabiani)神父来信:“毕嘉神父负责的江南教区屡发生‘奇事’。一件是,在一场大火中,只有一位基督教徒的房子幸免于难,他周围的四十多间房子都毁于大火;另一件是,在一位热忱的基督教徒的祈祷下,一位不信教的人被从恶魔的折磨中解救出来;第三件是,一个小孩掉入一口深井中,一双看不见的手把他接住并救了上来。每天都有大量的非基督教徒到他那儿去,有些是受不了良心的责备,有些是遭遇了可怕的事情”。沙守信神父认为是上帝利用这些情绪使他们相信永恒的事物^{[11](P.199)}。

四

教堂肃穆、庄严的气氛以及精美的绘画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中国人习惯于佛寺的庄严气氛,而教堂中华丽的场景及精美的绘画往往也能激起中国人的好奇心,绘有巨大而美丽画面的壁毯常使他们驻足观看。顾起元《客座赘语》描述了天主画像:“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12](卷六(利玛窦))}

《帝京景物略》记北京宣武门内教堂:“堂在宣武门内东城隅;大西洋奉耶稣教者利玛窦,自欧罗巴国航海九万里入中国,神宗命给廩,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稣像其上,画像也,望之过塑,貌三十许人。左手

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次,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有矚,口容有声,中国画绘事所不及。所具香灯盖帟,修洁异状。右圣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儿,耶稣也。衣非缝制,自顶被体,供具如左。”^{[13](卷四(天主堂))}

人们对这些与佛教寺庙截然不同的华丽装饰产生一种莫名的感觉,画像、圣歌、钟声、乐器声以及仪轨等,在一些人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并最终把他们引向对主的崇拜。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quet)神父在信中说:“根据我对中国人天性的了解,如果我们将宗教仪式搞的更辉煌亮丽,一定会对中国人更有吸引力”^{[11](P.224)}。《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称:1641年,毕方济神父在南京城内建一教堂,“堂内用西洋画法绘一图,附以说明,右为善天使图,分天使为九种;左为堕落地狱之恶天使图。教内教外人见图新异,争往观之,因而不乏受洗者。”^{[3](P.145)}甚而人们还会把教堂里的画像与自己所熟悉的形象进行比较,《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经常能够看到人们把圣母当作是佛教中送子娘娘的事例,对之磕拜祷告求子,甚至求平安生产。

五

可见,中国的平民百姓信教,少有或没有宗教理念上的阐释和思索,他们只是出于生存安全的需要。这点在社会动荡不安时,表现尤为明显。同时,基督教宣扬世界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提出只要信徒与基督一起战胜邪恶与死亡,灵魂就会得到拯救。这种解脱手段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他们很相信天主教所宣扬的“其有为善而贫贱者,或因为善之中,有小过恶焉,故上帝以是现报之;至于歿后,既无所欠,则人全福之域,永享常乐矣。亦有为恶而富贵者,乃行恶之际,并有微善存焉,故上帝以是偿之;及其死后,既为可举,则陷深阴之狱,永受罪苦矣”^{[4](P.68)},对诚心信教死后灵魂能够升入天堂永享快乐笃信不疑。

另外,中国平民信徒之间常为亲属关系。中国人一般过着聚居生活,这种联系的紧密性

使得亲朋邻里间会相互效仿，常有信教者不仅自己一家信教，其亲朋好友、亲戚都是教徒。如南京教案中，被抓的成年教徒虽只有十七名，但他们之间关系还挺微妙。除去五人受传教士劝化、二人信教缘由不详外，余皆为亲邻所劝：结帽为生的江西人曹秀夫妇都信教，曹秀带动了表侄余成元、内弟王文及邻居夏玉入教；余成元又带动浙江人王甫入教；汤洪受其兄汤应科的劝导而入教（母舅王桂亦因信教被抓，但

病故），两名中国修士钟鸣礼、钟鸣仁都因父信教；方政受其叔方文榜劝化；涨宗受同乡称说。这种滚雪球一样的发展，有时起到的作用比传教士说教还有用，连仇教者都说，“夫一人能鼓数十人之信从，数十人便能鼓百人，既能鼓惑百十人，即能鼓惑千万人”^[4](卷二,P.33)。他们凭借亲戚、邻居、同乡的关系组成一个个小小的奉教团体，互相关爱、经常聚会。

[责任编辑 胡晓明]

参考文献：

- [1] (意) 利玛窦. (比)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 [M]. 何高济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2] (法)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M].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 1995.
- [3] 徐昌治. 破邪集 [M] 安政乙卯冬刻本.
- [4] 朱维铮.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5] (比) 钟鸣旦.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Z]. 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 1996.
- [6] (法) 谢和耐. 中国和基督教 [M]. 耿昇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7] (法) 裴化行. 《利玛窦神父传》(上) [M]. 管震湖译. 商务印书馆. 1998.
- [8] (明)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M]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中华书局, 1979.
- [9] (法) 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III) [M]. 朱静译. 大象出版社. 2001.
- [10] Noël Golvers, Franç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 - shu (Chiang - nan).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1674 - 1676) and the Elogium,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1999.
- [11] (法) 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I) [M]. 郑德弟等译. 大象出版社. 2001.
- [12] (明) 顾起元. 客座赘语 [M].
- [13] (明) 刘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 [M].

Reasons and Causes for the Ordinary People Believing in Catholic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ou Pingping

Abstract: Bases on the real conditions of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that time in China,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to China made propaganda on the doctrines such as mortal beings, the heaven and the hell, which were attractive to people liv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thus having Catholicity spreading among the ordinary people.

Key words: ordinary people; Catholicity; the Society of Jesus

明清间平民信奉天主教原因之探析

作者: [周萍萍](#), [Zhou Pingping](#)
作者单位: [南京晓庄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17](#)
刊名: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NANJING XIAOZHANG COLLEGE](#)
年, 卷(期): 2004, 20(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3条)

1. [利玛竇, 金尼閣, 何高济](#) [利玛竇中国札记](#) 2001
2. [费赖之, 冯承钧](#)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1995
3. [徐昌治](#) [破邪集](#)
4. [朱维铮](#) [利玛竇中文著译集](#) 2001
5. [钟鸣旦](#)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1996
6. [谢和耐, 耿昇](#) [中国和基督教](#) 1991
7. [裴化行, 管震湖](#) [利玛竇神父传\(上\)](#) 1998
8. [沈德符, 野获](#)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1979
9. [杜赫德, 朱静](#)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II\)](#) 2001
10. [Noel Golvers, Francois de Rougemont](#) [Missionary in Ch'ang - shu \(Chiang - nan \).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1674- 1676\) and the Elogium](#) 1999
11. [杜赫德, 郑德弟](#)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 2001
12. [顾起元](#) [客座赘语](#)
13. [刘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

相似文献(7条)

1. 期刊论文 [张振国](#) [从入教动机看明末至清中前期中国平民信徒的信仰心理 - 东岳论丛](#) 2010, 31(9)
中国人在对待民间神祇上的实用主义态度, 曾使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对福音的传布充满信心, 而且, 如果单从神父施洗的数量看, 即使在禁教时期, 传教士的布道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然而, 通过对中国平民信徒(即教民)归化的真实动机的考察, 我们发现, 对于相当一部分教民而言, 他们无法在信仰心理的层面完全摒弃功利主义的影响, 即从实际层面来讲, 洗礼仪式的完成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收获了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 因为这种归化背后的真实推动力也许并不是天主对天堂永福的承诺, 而是他们对现世福祉的祈愿。
2. 期刊论文 [刘钧艳, LIU Jun-yan](#) [中日两国接受西学途径之差异——关于适应主义策略差异的探讨 -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28(6)
适应主义策略是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竇等耶稣会士在东方传播天主教的重要方法之一。适应主义在中日两国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针对对象: 日本的平民阶层和中国士大夫群体。适应策略在中日两国工作对象的差异, 是导致中国缺乏类似日本兰学阶段的原因之一。
3. 学位论文 [张运春](#) [浅论山东地区衍义和团的原因——由“官、民、夷”互动的视角解读](#) 2007
1895-1899年, 山东地区民教冲突愈演愈烈, 教案数量逐年递增。与此同时, 山东各地拳会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并最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 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义和团运动。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 为什么义和团运动能够在山东地区突然爆发? 这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解答这一问题, 本文认为必需关注民众、清政府、列强三大国际国内势力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斗争的状况, 追寻清朝政府和德法等国外来势力对山东义和团兴起的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山东地区义和团逐渐兴起的过程, 正是清政府与德法等帝国主义势力在山东地区此消彼长的过程, 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侵占胶州湾之前, 德法等国对山东事务的干涉和影响并不十分严重。此一时期, 清政府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天主教于干涉地方事务的现象, 消弭民教之间的矛盾, 但是清朝中央政府李秉衡为首的山东地方政府对外来干涉进行了有限度的抗争。这就使得山东地方政府的权威暂时没有遭到大规模破坏, 有利于山东地方社会的安定。但是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 形势大变。随着德法等国对山东事务的关注和干涉日益扩大, 山东天主教会也越来越多的参预到平民与教民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和诉讼之中。教民以教会为护符, 大肆欺压平民。对此清朝各级政府都没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这就势必导致民教冲突愈加激烈。在政府不能充分保护平民利益, 伸张正义的情况下, 拳会组织、拳会运动成为平民保卫家产、生命, 维持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 拳会打教活动应运而生。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看到, 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为抵制外来势力在山东地区的持续扩张, 维护清政府利益, 没有一以贯之地严厉取缔各地拳会组织, 坚决镇压拳会运动, 而是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纵容和鼓励。正因如此, 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地区遽然爆发。
4. 期刊论文 [陈静, CHEN Jing](#) [走下神坛的少女——论萧伯纳历史剧对圣女贞德的形象重构 -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1(4)
文章指出萧伯纳历史剧《圣女贞德》(1923)至少从两方面重构了法国历史上这位天主教圣女形象: 其一, 贞德形象被平民化, 消解了笼罩着她的神异光环; 其二, 贞德被赋予明显的新女性和新教(而非天主教)殉道士等多重意义。进而分析形象重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缘由, 并揭示了真正将贞德引向火刑柱的

是她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他者身份。剧本由此承载了关于如何对待他者的普遍思考。

5. 学位论文 张磊 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研究 2007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开始侵入中国，对中国展开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生活日加困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整个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严重境地。中国传统的中医学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传统医疗是以中医为主。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医凭借优势开始在中国植根与传播，并逐渐对中医的地位和规范提出挑战。中国的医疗体系也随之发生改变。

清末作为清朝政治中心的北京，人口约有百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医疗需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的研究，来分析清末北京的医疗机构的构成及其在清末医疗卫生体系的地位，借以考察中国是如何从传统医疗卫生体系向近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转变。

清末北京城内主要有官办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慈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四种医疗机构的存在。清末受西方影响，政府兴办了官医局、官医院等多种形式的官办医疗机构，主要面向广大贫苦百姓，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封建社会中，历代皇帝只注重为皇室服务的太医院，而对平民百姓却并无专门的国家性质的医疗机构，往往只是设立一些针对鳏寡孤独之类人群的慈善机构，或成立一些临时性质的医疗机构，轻视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卫生机构建设。到了清末，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运动的开展，清政府才开始兴办各种近代企业和公共卫生事业，产生了内外城官医院这些专为百姓看病的医院，内外城官医院从创立伊始即有了中西医并重的主导思想，这开创了近现代医院内部中西医发展并重的先河。

中国传统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官方医疗机构自古以来（以太医院为代表）服务对象主要是面向宫廷及一些主要的政府官员等。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患病时只能求助于民间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从服务对象来说，主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间或也为政府官员服务。虽然在清末建立了几所官医院，但对于实际医疗需求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医疗需求。中国从古至今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民间各种形式的中医诊所、药店等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担着广大劳动人民医疗的重任。尤其在清朝灭亡后，太医院解散，代表着国家医疗最高水平的医生进入民间，增强了民间医疗实力，促进了民间医疗水平的提高。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地位，而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取得了在华传播教义、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办学兴医等多种自由权。于是，大批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教会医疗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十余所教会医院，通过施行一些慈善医疗措施，使得西医在民间也逐渐得到了认可，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医疗观念。清政府的医疗观念也发生转变，其标志便是在清末建立的官医院中设立了西医部。

清末初涌现了大量的善会、善堂等慈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从民间筹集资金，成立专门机构来救济广大的贫民百姓以及鳏寡孤独等特殊人群。这些慈善机构除了解决救济人群的日常生活之外，对他们的日常医疗需求也是非常重视的。中国传统的慈善医疗机构中，往往都包含有医疗救助活动在内在，在清代就有普济堂、育婴堂等善堂、善会为患病者提供医疗救助。在首善之地的北京，就有以普济堂、育婴堂等为代表的慈善机构从事医疗救助活动。其中尤以普济堂在规模、管理、资金来源等方面最为成熟，且成效显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济堂在收治病人的时候，已经有明确的分科诊治思想，对于传染性病患者，更是将其与其他病人分开诊治，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本文在讨论部分主要从清末京师医疗机构发展脉络、清末京师医疗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对民国初期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清末北京医疗机构的发展是从中医独立发展向中西医发展并举的方向进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西医的发展规模、影响也是在不断扩大的，这也造成了中医发展一直滞后于西医的发展。

总的来说，清末京师的医疗机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官办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慈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构成了清末京师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这一体系尽管因为当时政府腐败，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却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清末建立的医疗机构在清朝灭亡进入民国后，大多都继续存在，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大重要成就。清末京师医疗机构的发展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基础，研究这一时期医疗机构的发展变迁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发展变迁对卫生事业的影响，这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天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一些借鉴。

6. 期刊论文 毛建波 从任伯年反思当代人物画 -美术观察2002,“(10)

任伯年辞世离现在仅仅百年，而作为一位出身平民，以画谋生的民间画家，任伯年虽然以出色的才艺跻身海派大师的行列，甚至对吴昌硕的绘画产生过很大影响，但由于他不入文人行列，同时代人很少记载他的事迹。所以史籍中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寥寥无几，语焉不详，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引起我格外注意的是，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任伯年一段特殊经历，即他的一位好友刘德斋是当时上海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土山湾所办图书馆的主任，俩人往来甚密，刘德斋的西洋画素描基础较厚，对任伯年的绘画有一定影响。

7. 学位论文 陈丽红 巴赫音乐的人文探究 2006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于1685年3月21日诞生在德国图林根州爱森纳赫的一个音乐世家。当时欧洲经历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思想在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呈现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并直接导致德国产生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创造众赞歌这种音乐体裁。众赞歌的旋律采用民间曲调；歌词用德语代替拉丁语，打破了天主教会对于宗教音乐的垄断；增强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因此富于人文精神。众赞歌后来成为巴赫创作音乐的源泉，在他所写的宗教音乐作品中，有3/5以上是以众赞歌为基础，着重表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平民思想。而在他所写的世俗音乐作品中，也表现了德国市民阶层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

全文由绪论和三个章节组成。绪论就本课题的背景和研究现状进行阐述。第一章介绍巴赫的生平及艺术成就。第二章介绍人文思想产生的原因，接着阐述人文精神对巴赫思想的影响，思想决定创作，最后阐述人文精神对巴赫音乐的影响。第三章从巴赫的宗教音乐、世俗音乐、教学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巴赫音乐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jxzyxb200401018.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6d4f0dae-8ac7-427e-8fb4-9e4d00733dba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